

宏观经济周期性风险可控 结构性挑战艰巨

■ 于泽



从8月份宏观经济运行可以看出,通货膨胀、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引发进出口和投资波动等周期性风险本身是可控的。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还是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这种乏力在贸易摩擦环境中会进一步放大短期风险因素,成为未来最大的风险来源。

以产业升级为取向,减税好于扩大基建,但这都不是最有效政策。市场不能自发完成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介入。针对转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选择,但是在执行中需要从上游行业减产产能转移到关注接近消费端的下游行业转型。

周期性风险可控,经济回旋空间较大

在多重冲击下,8月份工业服务业依然稳定,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加强,社会总体价格水平稳定。这表明宏观经济韧性很强,短期冲击自身是可控的,完成全年预定经济目标问题不大。

工业和服务业稳定向好。1月份-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稳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9%。在国内相对稳定的消费市场保障下,工业、服务业对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有足够的支撑。

固定资产投资未来会逐渐企稳。1月份-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3%,增速比1月份-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但是随着基建投资发力,会逐步抑制下滑,处于相对稳定趋势。

价格稳中有升,通货膨胀压力有限。未来

CPI推动力量主要来自非洲猪瘟对猪肉价格影响和伊核协议、美国飓风推动的石油价格上涨。燃料类价格同时也是推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由于工会会推动石油价格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可控,对货币政策空间的挤压有限。

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未来抗风险能力提升。1月份-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1%,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46%,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同时在减税放权的作用下,经营成本增速显著下降,利润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为应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等提供了较好的抵御空间。

宏观景气持续,市场主体信心回升。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3%,保持平稳扩张态势。特别是中小企业PMI指数均处于扩展,显示了较好的态势。由于中小企业利润低,是受到冲击最为明显的,

这意味着经济总体态势健康。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2%,非制造业总体扩张步伐有所加快,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4.3%,其中,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PMI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1月份-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分别增长11.9%、8.8%和8.8%,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4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结构进一步优化。1月份-8月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16.33+0.37%,诊股)、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6.0%、19.4%和13.4%。经济质量稳步提升。

社会融资环境总体平稳,不用过分担心存款增速。8月份社会融资总额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今年累计社会融资比去年减少

18964.7亿元。社会融资总额是和投资密切相关的,随着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力量不断加强,社融变化是正常的。在降杠杆稳定金融风险的导向下,今年总体流动性提供是可以接受的。未来存款增速放慢会是一个常态化现象,不用过度解读。

中国经济最值得担心的不是近忧而是远虑。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出现了严重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这在面临贸易争端等因素时候会放大短期冲击,造成市场焦虑心理,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源。

当前内生动力不足是要素推进型赶超阶段逐渐接近尾声的必然现象。关键问题就是创新引领下的持续增长。增长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是行业的转型,是新技术推动下的新行业的兴起和传统行业提升。增长模式转型的困境在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迟缓。

政策建议

由于短期风险是可控的,最大的风险来源是转型迟滞放大短期冲击,所以宏观政策在适度关注短期的同时更要关注结构转型,要以促进产业升级为判断依据。

一是特别关注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行业影响。一般认为宏观政策主要关注总量,实际上总量的宏观政策都会落实到具体的产业。货币政策尤其是容易被认为是总量,但是会通过不同行业的融资依赖度影响融资密集型不同行业的发展,所以要特别关注定向信贷,促进转型。

二是短期内要切实加大企业减税力度,推进上游国有企业产品适度降价,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在转型的过程中企业有很大的资金投入,当前企业有面临短期不确定性,这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和坚实的资产负债表。为了更好地修复下游行业资产负债,需要落实好减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国有企业集中的上游采掘业和原材料行业价格上涨推升了下游总体成本,建议国有企业适度降价,补贴下游,为转型和防风险做准备。

三是基建,尤其是道路等基建,不是现在产业升级的迫切短板。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等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并不构成

中国从传统制造向现代制造转型的障碍。大规模基建主要带动的是建材和建筑业。这两个行业上升虽然在总量数据上会很好看,但主要是用建筑业掩盖制造业转型,并不会在实质性促进转型。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基建投资抵御风险最后更多依靠的是基建投资争取的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在当前阶段,这种思路是不合适的。

四是财政支出更应该关注职工培训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减少企业社保缴费。转型过程中企业难以承担职工行业转换的培训成本等,这些需要财政来进行帮助。职工培训、社会安全网是产业转型真正的短板。二战后,美国青年士兵上大学等政策很好地起到了职业培训作用,为战后美国经济发展转型奠定了基础。为了让企业有更多资金,财政需要更好地承担社保职能,降低企业费用。

五是切实加快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加大转型的社会保障力度。财政承担社保职能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转型期,加之我国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历史负担,社保资金缺口很大。这部分需要国有资产划拨来弥补。这项政策早有规定,但是执行较慢,在当前需要加快。

六是适当允许增加金融机构风险暴露。转型期不宜从外部过分收缩信贷条件,强化金融风险治理和监管,促进转型必然涉及资产重估,旧有行业资产价值会大幅度下降。现在我国信贷风险增大大部分原因也与此有关。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此时,不宜在外部进一步紧缩信贷条件,降低金融机构贷款意愿。需要在内部加强金融风险治理和监管,提升风控水平,加大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建设,提升开发。

七是加大跨境资本监管,维护国内各项资产价格稳定。虽然在产业转型期资产价格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目前转型迟滞,放大短期风险的环境中,资产价格调整必须有序,防止引发金融危机。在美国加息,美元强势的大环境下,需要加大跨境资本监管,切实维护好国内资产市场平稳。

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 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王晓红

业既是对外开放的重点也是难点。

一是服务业开放水平还不适应世界服务业开放的总体形势。在服务业外商投资准入方面,201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62个主要经济体的外资准入限制性指数,我国综合评价居第4位,其中服务业高居第2位,说明服务业开放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也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是营商环境是影响服务业外资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比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更具吸引力。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需要加快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配套体系来引进海外人才,等等。

三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服务业开放涉及多个部门,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仍是难点。而且,在海外投资体系中缺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机制。服务业对制造业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四是事中事后监管创新不足。总体上看,目前的监管水平还不能适应服务业开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全产业链、全流程、全覆

盖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多头管理比较突出,随着跨境电商、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全球价值链高度依存、高度发展的今天,哪个产业开放程度高发展相对就快,国际竞争力就强;哪个产业开放程度低发展就相对慢、竞争力就差。当前,我国的产业开放优势正在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在产业基础、人才结构、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服务业开放的优势和充分条件。2017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占GDP的比重51.6%,预计未来几年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大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为服务业开放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2017年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2753.6万人,在校研究生263.9万人。截至今年6月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024万公里,移动宽带用户总数12.6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8.32亿个,移动通信基站624万个。庞大的知识人才规模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我们吸引新兴服务业的优质外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为此,应遵循“安全高效、多元平衡”的原则,以服务业开放

为主线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完善与服务业开放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继续发挥外商投资在人才、技术、知识、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外溢效应,促进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通过开放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与“中国服务”共同构成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竞争新优势。

第一,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深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培训。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负面清单管理便利化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将外资企业准入、人才引进海外专业人才的移民制度及就业、医疗、子女上学等服务体系。探索个税减让政策,让外资“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

第二,完善外资审查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以国家安全、产业安全、市场公平竞争为导向,完善负面清单管理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将外资纳入国内产业体系的框架统一管理,对外资企业合规经营、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依法监管。提高监管信息化水平,推动全流程监管、大数据监管、智慧监管等新模式。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

进政府部门信息共享、执法互助。

第三,完善跨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服务业开放涉及领域多、政策体系复杂,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尤其是在制定相互衔接的法律法规和促进政策,建立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全覆盖的监管体系,以及开放风险评估、开放路径与时间表等顶层设计方面要注重协调并进。

第四,建立服务业和制造业走出去的协同联动机制。近年来,我国制造企业在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等“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卓有成效,应利用制造业境外投资、设立境外产业园区的机遇,带动金融、法律、市场、信用评级、技术服务、知识产权、市场营销等服务机构跟随性投资,在为境外企业保驾护航的同时扩大服务出口。

第五,鼓励试点地区加大探索创新力度。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大胆探索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新机制、新路径和新模式,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尤其是在营商环境建设、服务贸易发展、监管模式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不断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继续深化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发挥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推动服务业开放的体制机制创新。

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对提高服务业的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尤为关键,也是稳就业、稳贸易、稳外资的重要保证。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既是我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国内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既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也符合国情实际。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开放水平对提高服务业的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尤为关键,也是稳就业、稳贸易、稳外资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2017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954.4亿美元,占总量的72.8%;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813亿美元,占总量的67.7%;服务贸易进出口额6956.8亿美元,连续4年保持全球第2位。2018年版全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这为扩大服务业开放创造了有利环境。但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服务业开放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因此,服务

▶▶▶ [上接 A2版]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民营经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大提升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地位。这相对于解决长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无形的、制度的和非制度各种障碍的消除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的阶段。2015年9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意见》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配套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尽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有形无形的障碍,但在多方努力之下,还是逐步推进着,并且取得一些重要的突破性进展。

方案。此次混改中,中国联通拟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约617.25亿元,拟通过联通BVI公司以认购联通红筹公司配售、供股运营等方式用于“4G能力提升项目”,“5G网络技术验证项目”和“创新业务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将有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参与混改的9家战略投资者,既有财力雄厚的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更有在互联网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民营互联网公司,这些互联网企业也能够借助中国联通既有市场资源,拓展业务空间。中国联通作为我国信息通信产业的垄断巨头,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为其他各个部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样板,其重大意义和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后,一些传统上国有企业垄断部门也出现一系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案例,并且进一步推动了其他非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进入了过去“禁入”的行业,获得了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垄断利润,事实上是打破了传统的行业垄断,引进了竞争,提高了行业效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从垄断角色转换为竞争角色,吸收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经营效率。

(三)民营经济迎来了新时代

民营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

临新的挑战。民营经济解决了市场准入问题,不仅与国有经济站在平等的竞争地位之上,也同时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面对着国内市场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考验。为了进一步明确和增强民营经济的地位,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对涉及重大财产权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个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

出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不仅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还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不规范经营问题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此后,国家各部门相继出台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2017年11月20日,工信部、发改委、证监会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发挥民间投资作用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导意见》,针对近年来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放缓、活力不强的局面,提出了八项提升民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鼓励支持制造业民营企业提升创新发展能力、两化融合水平、工业基础能力和质量品牌水平,推动绿色制造升级、产业结构布局优化、服务化转型

以及国际化发展,指出了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任务和工作措施;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包括人才激励制度供给,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企业激励机制,健全企业公共管理,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以及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全方位提升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水平,推动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制造业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十九大以后,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新时代。

总体来看,我国民营经济的曲折历程,呈现了一个“U”形发展轨迹。以1978年改革开始为分界,30年,以民族资本为代表的工商业和其他个体私营经济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脱胎而生并成长壮大。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重大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挑战中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民营经济处于创业阶段,解决的是快速发展问题,依靠的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以后的中国民营经济则进入新的创业阶段,解决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民营经济必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支柱,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必然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完)